

## 文选六十卷

（南朝·梁）萧统辑，（唐）李善注，宋淳熙八年（1181）尤袤池阳郡斋刻本（丁钩跋）。板框高21.3厘米，宽14.5厘米，每半叶十行，行二十一字，小字双行同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

北京图书馆编《中国版刻图录》谓此本“原为杨氏宝选楼藏书，初印精湛，字字如新，无一补版，可称《文选》李注唯一善本”。1974年7月，中华书局曾据此本按原大影印出版，《影印说明》曰：“北京图书馆所藏南宋淳熙八年尤袤刻本，是现存完整的最早刻本。这个本子，目录和《李善与五臣同异》中有重刻补版，正文六十卷中除第四十五卷二十一叶记明为‘乙丑重刊’外（在影印本这一叶已改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中的初刻），其余部分还是尤刻初版。”

尤袤（1124—1193）字延之，号遂初，常州无锡（今属江苏）人。绍兴十八年（1148）进士，终官礼部尚书。以诗名世，与陆游、杨万里、范成大并称“中兴四大家”，其诗文集今存清人所辑《梁溪遗稿》二卷。尤氏又长于目录、版本之学，著有《遂初堂书目》，开书目著录版本之先河。

淳熙五年（1178），尤袤提举淮南东路常平改江南东路。江南东路之池州，治贵池（今属江西），尤袤以“贵池在萧梁时实为昭明太子封邑”，其地有昭明庙，“庙有文选阁，宏丽壮伟，而独无是书之板，盖缺典也”，“因以俸余钱，会池阳袁史君助其费，郡文学周之纲督其役，逾年乃克成。既摹本藏之阁上，以其板置之学宫，以慰邦人所以尊事昭明之意”（尤袤淳熙辛丑上巳日跋语）。其中“袁史君”指袁说友（1140—1204），淳熙六年知池州，下车伊始，得闻“仓使尤公方议钱《文选》板以实故事”，以为“尤公博极群书，今亲为雠校，有补学者”，遂勉力襄助，“阅一岁有半而后成”（袁说友淳熙辛丑三月望日跋语）。此即尤刻本刊行始末。

尤刻本是现存最完整的李善注本，但尤刻所据之底本，究竟原为李善单注本，抑或“从六臣本中摘出”之重编本，则莫衷一是。清修《四库全书》，馆臣未曾见到宋刻《文选》诸本，故其《四库提要》仅能依据内府所藏明末汲古阁刻本遽下结论，臆断李善注本乃“从六臣本中摘出”。其实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著录的《文选》版本，祇有李善本和五臣本两种，未见有六臣本。表明尤袤当年似无意“从六臣本中摘出”李善注而另谋新编。

据傅刚《文选学研究》报告，以尤刻本与今存北宋刻递修本相校，异文甚多，证明二者并非同一来源，尤刻显非北宋监本的翻版。惟以尤刻本与五臣注本相校，尤刻“的确有合于五臣或掺入五臣的地方”。故可以认为“尤刻本（或者说是其底本）是一个以李善本为主要依据，又旁参五臣、六臣而合成的本子。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基于它大体上合于李善本（国子监本），但又有大量注文及正文遵从五臣的事实”。此说颇中肯綮。

尤刻虽非出自北宋监本一系，但却是南宋以来一切李善注单刻本的祖本。其覆刻、重刻本计有：（1）元池州路张伯颜刻本（据尤刻本重刻）；（2）明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）唐藩朱芝址刻本（据张本重刻）；（3）明嘉靖元年（1522）汪谅刻本（据张本覆刻）；（4）明嘉靖四年（1525）晋藩养德书院刻本（据成化唐藩本重刻）；（5）明隆庆五年（1571）唐藩朱硕燠刻本（据张本覆刻）；（6）明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）邓原岳刻本（据元张氏本重刻）；（7）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（据元张氏本重刻）；（8）清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胡克家刻本（据尤刻本覆刻）。八种翻刻本中，尤以清嘉庆胡刻本最为通行。不过胡氏所用底本，却非宋淳熙八年尤刻初印本，而是一个屡经后人修补的印本。故胡刻有异于尤刻，不足为怪。

尤刻本末附《李善与五臣同异》，乃现存唯一的宋刻本，弥足珍贵，但亦需指出：“现存宋刻《同异》是个递修本，而且字迹模糊，还经人用墨笔描改，已非原貌”，“与影宋钞本和翻刻本相较，可以发现它较多地保留了原书的真面目。所谓影宋钞本和翻刻本大概正是从这样一个模糊的印本出来的，不知什么人又对一些辨认不清的字妄加描改，增加了不少新的错字”（程毅中、白化文《略谈李善注〈文选〉的尤刻本》，《文物》1976年第11期）。

（许逸民《中华再造善本提要》）